

王基倫 著

唐宋古文論集

秦孝儀題端





唐宋古文論集

作者◎王基倫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唐宋古文論集／王基倫著

-- 初版. -- 臺北市：里仁，民 90

262 面；15×21 公分

參考書目：14 面 含索引

ISBN 957-8352-89-1 (平裝)

1. 中國散文-唐(618-907)-評論

2. 中國散文-宋(960-1279)-評論

825.84

90017067

· 本書經作者授權在全世界出版發行 ·

王 基 倫 著

唐宋古文論集

校對人：王基倫·謝敏玲

發行人：徐 秀 榮

發行所：里仁書局（請准註冊之商標）

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五樓之2

電話：2391-3325，2351-7610，

2321-8231

FAX：3393-7766

E mail: lembook @ ms45. hinet. net

排 版：帛格有限公司

印刷所：琦海印刷有限公司

郵政劃撥：01572938「里仁書局」帳戶

中華民國九十年十月十五月初版

參考售價：平裝 300 元

ISBN 957-8352-89-1 (平裝)

唐宋古文論集 目錄

羅序	一
導言：受故納新，與時俱進	三
——唐宋古文研究的新向度	三
韓愈散文的讀者接受意義	二一
——中晚唐至北宋中期的考察	二一
一、前言	二一
二、歷史「傳統」框架之形成：道與文的考察	二九
三、文本與讀者關係之轉變：怪怪奇奇的考察	四二
四、結論：從韓愈散文定位看宋人創作質素的考量	五四
《書》與柳宗元古文表現風格之關係析論	七一

一、儒學內容之建立	七二
二、對《書》的文學見解	七六
三、《書》與柳宗元古文之創作	八一
(一)取用經典的數篇文例	八二
(二)發揚「大中之政」精神	八四
(三)改創經義的〈封建論〉	八七
四、結 論	九二
《春秋》與柳宗元古文表現風格之關係析論	九九
一、對《春秋》的文學見解	九九
二、《春秋》與柳宗元古文之創作	一〇二
(一)辯明《春秋》經義	一〇三
(二)效法《春秋》筆法	一〇八
(三)發揮斷事論理精神	一一三
三、餘 論	一六

宋世格調：歐陽修古文的深層解讀	一二三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一、「宋調」與「俗調」之區別	一二四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二、歐陽文「格調」之形成	一二八
--------------	-----

三、歐陽文「格調」之深層解讀	一三五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四、結 論	一三八
-------	-----

曾鞏文之體類區分及其意義	一四五
--------------	-----

一、曾鞏文之體類區分標準	一四六
--------------	-----

二、曾鞏文之體類釐清	一五一
------------	-----

三、曾鞏文體類區分後之現象所呈顯的意義	一六八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四、結 論	一八四
-------	-----

附 錄：

歐陽修〈縱囚論〉的「言」與「意」	一九三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一、語言分析	一九三
--------	-----

二、思想分析	一九六
三、幾點推論	二〇〇
有關歐陽修研究的幾個問題	
——劉子健《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》評析	二〇三
一、「簡而有法」的真義	二〇五
二、從政態度的補充	二一〇
三、標目方面的問題	二一六
四、結語	二一九
參考書目	二二五
引用人名篇名索引	二三九

唐宋古文論集序

王君基倫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、所，獲碩士學位後，進台大中文研究所深造，研究唐宋文學。以《韓歐古文比較研究》為題，撰寫論文，得博士學位。

台大第一代中文系教授，多來自北大，承傳北大實事求是學風，造就一批學者，世代推移，環境改變，若干年後，此種學風似已漸趨式微。惟仍有不少後進學者尚能維繫此風於不墜，王君基倫濡染薰陶，承繼前輩治學精神，從事研究。凡有所著皆能秉持「取證立論，無證不論」原則推陳出新。多年來教學之餘，著述不輟，出版有《韓柳古文新論》、《孟子散文研究》等專書及論文多篇。又編注《韓愈詩選》、彙輯《韓愈古文校注》，在學術上有相當價值與貢獻。

本書乃其近年所作論文集，共七篇。不論辨證問題，析論舊說，皆能深入探討，抉發幽微，因而多所創發，提出新見。如柳宗元自言為文「本之春秋以求其斷」，讀者或不得其解，王君於《春秋與柳宗元古文表現風格之關係析論》文中，舉證闡明，認為柳宗元論

辨之類文章皆以斷案作結，用的乃是春秋筆法。經此詮釋，不得其解者，即豁然而通。又《歐陽修古文的深層解讀》一文，列舉詳證，辨前人疵議歐文有「俗調之譏」，不能成立。可謂平正通達，甚為可貴。又書中有一新穎論題：《韓愈散文的讀者接受意義》，不用傳統知人論世批評法，而採取西方近年流行接受美學理論，考察中晚唐至北宋中期韓文讀者接受意義。認為韓文風格到北宋已經轉化，去除晦澀而趨向平易。從後世讀者立場來論韓文，為韓文研究開拓新境，實有其意義與價值。

「受故納新，與時俱進」，茲以台大中文學報創刊詞兩語，期勉之。

辛巳春羅聯添序於台北市溫州街永嘉樓寓所

導 言：受故納新，與時俱進

——唐宋古文研究的新向度

唐（618—907）宋（960—1279）古文作為文學研究材料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，如何加入新的研究方法，使其源泉滾滾，盈科而後進，是很值得思考的問題。

過去對唐宋古文的研究，實證主義是不可忽視的基礎方法。龔鵬程（1956—）曾以小說研究為例說：「所謂實證主義的方法，是指在小說研究中，以尋找材料、確定版本、考證作者、說明流傳沿革、討論寫作年代，兼及其與外部社會之關聯等為主要之方法與研究旨趣者。」^①此一說法，同樣適用於已往的古文研究，偏重於作品外圍問題的考證，意圖從作家生平、家世、思想、年譜、作品考證、文集校注等實證研究，聯結至作品內部意義結構的探討。

考證作為文學研究之基礎方法，恐怕可追溯至乾（1736—1795）、嘉（1796—1820）之際的樸學，仍是目前臺灣大多數大學中文系所能給予學生的主要訓練，「實證主義方法倘只停留於『版本、作者、故事來源、寫作年代』之類的考證，當然有其局限，但若以之為進一步探求作品文學

性的基礎之一（不是基礎全部），則未嘗沒有用處（其作用大小端視所得資料之「可研究」價值而定），似不宜全盤否定。」②

近年來，年輕學者常捨棄考證舊路，引進西方文學理論來解讀中國古典文學，漸成風潮。周英雄（1939-）與鄭樹森（1946-）編《結構主義的理論與實踐》、周英雄《結構主義與中國文學》、古添洪（1935-）《記號詩學》、張漢良（1935-）《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》……等書③，可能是早期較具啟發性的書籍。這種研究取向乃採擷某些西方文學理論分析中國文學作品（材料），依目前的情況看，其寫法有二：一是先敘述理論之大要，再說明分析之方法，然後舉中國文學作品以坐實之；一是研究者取其所能懂，或捨棄理論與材料不盡相符處，於分析作品時，隨處點染穿插理論以行文；大概某些人相信尋求中西「共同的文學規律」或「共同的美學據點」，逐漸成為「可能」④，故上述運用西方文論以解析中國文學作品者的用心，重點在於「趨同」，甚於「別異」。⑤因此他們在「套用」西方理論之後，會嘗試重新建構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美學，「而對理論提出修正意見，或對方法之適用程度展開一些探討者，尚稱罕睹。換言之，應用方法者多，能進行方法論思考者仍然甚少。」⑥

「考證」與「理論」二派分途的現象，可說分別源自中文系與外文系。弔詭的是，有些外文系學者喜歡研究中國文學作品，有些中文系學者喜歡運用西方文學理論，各自「套用」的結果，

常造成讀者須跟隨西方學術詞語的進路，才能瞭解研究者分析中國文學作品之意涵。有時這種食「西」不化的現象，中文系學者更是如此。民國初年以來，王國維（1877-1927）、胡適（1891-1962）、朱光潛（1897-1986）、王夢鷗（1907-）、葉嘉瑩（1924-）……等學者，接收西學再以流暢之文筆詮釋中國文學作品的努力過程，今不易見。

其實，「考證」與「理論」二路可以是相輔相成、並行不悖的。「西方所說的 *literary criticism*，即指考證，仍有一定地位。……「偏重外國問題的考證」，目的……純為求真。……考證《水滸傳》、《西遊記》和《紅樓夢》等書的版本源流和作者問題，實有必要。正如西方學者考證《聖經》版本，以至莎劇作者真偽。」^⑦是故，學界實無重此輕彼之必要。問題之關鍵在於，執著於某一種研究方式之成型，會逐漸構築出一個研究傳統，它就「包含著一些理念的東西，如基本預設、價值觀、世界觀、歷史觀；也包含一些操作技術，如論文寫作之格式與語言、證明的手段、題目的選定等；以及其他與此相關的師承、權力、位置、知識系統、社會網路、發表情境、乃至師友情誼之類，錯綜複雜。」^⑧故而任何一位認真的學者，為了避免走入以偏概全的死胡同，乃至建立論文寫作的前瞻方式，自須用心思索未來治學的進路。

如果視唐宋古文為研究材料，在拾取某些西方文學理論進行分析這些材料之前，應對兩者能否相合先作評估。西方自古至今，詩、戲劇、小說即為重要文類，而中國則以詩、賦、散文為重

要文類。即使同為文學作品，中國文學傳統展現一種對日常生活或對人的興趣，而抑制對神的關心，也與西方不同。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（1894-1980）曾指出：「《五經》記載內容充分顯示出中國人的特性，因為《五經》的內容關切的是人類現實社會，超越感覺領域的記載十分貧乏。」

⑨吉川幸次郎又認為：「中國文學不論散文或詩均不尚空想虛構，而以普通人之日常經驗作為題材，與西方文學之虛構世界構成強烈對比。」⑩事實上，「英文 *prose*（散文）源自拉丁文 *prosa-ratio*（直接談）或 *prosus*（直接），與詩歌 *verse* 相對，後者源自拉丁文 *vertere*（轉彎）。因此 *prose* 的最大優點就是明晰，正如小說家喬治·奧威爾所說，優秀的散文「像窗玻璃一樣」透明，不幸的是，這個術語在英文裏已經帶上了消極的意義，……結果 *prose* 在西方批評中多遭忽視。這種態度也影響到了西方的中國散文研究，以致很少見到剖析散文作品的著述。」⑪綜合上述論點，得知西方文學尚空想虛構，對於記實而又帶有教化性質的散文，較不重視；依從某一西方理論來處理中國散文，即使只是方法應用的層次，亦有其困難。例如運用結構主義分析情節單元與衝突結構，運用心理分析討論人物性格與心理狀態，其適用於小說皆勝於散文。從文化背景觀之，將西方文學理論轉化至中國散文實際批評之研究，困難重重。

檢視現今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學的研究，標榜採用某一理論來處理中國散文者，確實不多見。據夏康達、王曉平《二十世紀國外中國文學研究》所載，有關「中國散文研究」仍以歐美為盛，

其譯介重點在先秦諸子、早期史傳、唐宋八大家和現代作家，研究重點在三個方面：

第一，西方學者多採用文類學研究，試圖深入揭示中國散文的結構特點和藝術特點。

……

第二，有些學者從修辭學角度來透視中國散文。高辛勇說，中西修辭學皆起源於演說術，後來逐漸被文學作品所吸收。兩者基本上也都是分作兩大種類：勸說性修辭（*persuasive rhetoric*）和裝飾性修辭（*ornamental rhetoric*）。……而且，中西修辭學在早期的發展中，與演說術、風格學、文類學、創作方法混淆在一起，是兩者共同的特點。而根據現代學術的看法，修辭學僅僅涉及寫作的語言技巧。……

第三，作家探索日漸深入，從而提高了整個散文研究的學術水平。這一點具體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：一是開始對作家作出全面而深刻的評價，二是開始以發展的眼光關照作家群體，三是開始鉤玄索隱，解決一些疑難問題。試舉例說明之。中國散文家（包括賦家在內）在西方得到深入研究者，只有揚雄（前53—18）、韓愈（768—824）、柳宗元（773—819）、歐陽修（1007—1072）、蘇軾（1037—1101）等少數鉅子。蔡涵墨（Charles Hartman）《尋求統一性的韓愈和唐代》（*Han Yu and the Tang search for Unity*. New Jersey: Princeton UP, 1986）一

書，是作家研究的代表作。全書分「韓愈生平」、「帝國政治」、「道統的一致性」和「風格的統一性」四章，而廣闊的文化背景，細膩的文本與思想分析和獨到的見解與結論是其學術特色。陳幼石的《中國古代散文的意象和觀念》（Stanford: Stanford UP, 1988）一書，則對唐宋八大家中的四大家——韓柳歐蘇作了深入的研究，在其相互的因承、影響之中，突出了他們不同的創作實踐和理論主張。……⑫

如此說來，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散文的步驟，一如本地學者，須熟習文本，採用文類學、修辭學的角度，進行文本特點之分析；或是對作家、文學集團、疑難問題進行深入之剖析，文學研究方法並無二致。

西方學術有其傳承體系，往往能推陳出新，如潮水般湧進名目繁多的理論。面對紛至沓來的西方文學理論，常令人有「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」（《莊子·養生主》）之感喟。綜合其研究對象不同的思維向度，可提出西方文學研究方法的四個方面，即：

（一）作家心理和創作過程研究，如文藝社會學研究法、傳記研究法、象徵研究法、精神（心理）分析研究法、（神話）原型研究法；（二）作品本體研究，如符號學研究法、形式研究法、新批評研究法、結構（主義）與解構研究法；（三）注重讀者接受研究，如現象學研究法、

解釋學（闡釋學、詮釋學）研究法、接受美學研究法以及讀者反應批評法；(四)注重社會文化研究，如西方馬克思美學文化批判法、後現代文藝美學研究法、女權主義文學研究法、解構主義文學研究法、新歷史主義文學研究法等。^⑬

其中有些文學研究法，中國古已有之，如孟子（軻，前372—前289）「知人論世」（《孟子·萬章下》）類似傳記研究法；也有些西方文學理論仍在發展、修改中，但後起學派往往能矯正前期學派之失，提供我們方法論的思考。西方的文學背景，為他們孕育出異類思考的環境，因而偶有不受限於中國傳統解釋的突發奇想——有時則是一種創意的表現。因此，當我們取用西方文學理論時，「主要應學習的是其『創意』精神，而不能滿足於搬用現成結論。」^⑭

以下即從寫作本書的經驗出發，說明近年來從事研究工作時，如何學習西方文學理論的「創意」精神，以及在西方文學理論不易轉化為中國散文實際批評之研究的情境下，如何深化傳統中國文學理論的研究方式，並且儘可能地提出唐宋古文研究的新向度。

一、韓愈散文的讀者接受意義——中晚唐至北宋中期的考察

西方重視讀者對文本的作用，且所謂「讀者」兼及廣泛大眾的層面，注重讀者接受研究的，

確是傳統中國文學理論較為疏忽的地方。就筆者見聞所及，臺靜農（1902-1990）、王夢鷗等前輩學者，偶然注意到讀者之接受研究，能從讀者角度討論文學現象。^⑤而一九七〇年代興盛的接受美學，儘管仍未發展成爲完善的理論，它仍然是一個研究新方向。

爲此，本書第一篇〈韓愈散文的讀者接受意義：中晚唐至北宋中期的考察〉，即初步嘗試運用西方文學理論解讀古代散文作品。該文採用接受美學理論學者姚斯（Hans Robert Jauss, 1921-）、伊澤爾（Wolfgang Iser, 1926-）的觀念，從讀者研究的立場出發，探討中晚唐至北宋中期文學家對韓愈散文的接受看法。研究過程中，將後來讀者對前代作家的觀點，排成「文學系列」作爲考察基礎。於是發現：韓愈提高了漢代辭賦家揚雄等人的地位，建立起道統與文統，逐漸形成歷史傳統的框架，影響中唐至北宋的文學觀。晚唐人喜學韓文怪奇手法，走向險怪晦澀的書寫思考，此與推尊揚雄的歷史傳統有關。由此看出韓愈散文「重道」與「怪奇」的兩條路徑，構成宋人討論學習的兩大支柱，也是北宋佔主導地位的「公眾期望域」；復可看出晚唐至宋初批評家的文學意見，或合乎歷史傳統的框架，或自出新義，如柳開（948-1101）、石介（1005-1045）等人文道合一的觀點，沿襲韓愈而來；皮日休（約834-883）、孫復（992-1057）、石介加入「王通（584-618）」爲聖門傳人的討論、柳開過度推崇韓文，則溢出韓愈的主張，有其較新奇的詮釋。另有王禹偁（954-1001）等人一路反對晚唐晦澀風格，又不願接受揚雄艱難之辭的作品，於是捨